

逃離與回歸：

《桑青與桃紅》及《綠島》中相異時代下的女性移動困境ⁱ

高于婷ⁱⁱ

摘要

本文欲討論以跨國移動為題的文學作品如何呈現女性的困境，藉由 Gayatri Spivak 的「與暴力結構協商」(negotiating the structures of violence) 與 Derrida 的「增補」(supplement) 兩概念，探討聶華苓《桑青與桃紅》(1976) 及楊小娜《綠島》(2016) 中女性主角的身分認同在移動中產生變化的原因，兼論作者相異的成長背景，使國家暴力本質差異與家庭存在的有無，成為影響兩部小說中女性主角的命運與認同差異之主因。

《桑青與桃紅》描寫的國共內戰到白色恐怖、《綠島》中的二二八事件直至 SARS，兩部小說儘管出版相隔四十年，但當中的女性主角在面對戰爭與國家政權威脅時，都不得不以持續移動當作抵抗手段，甚至跨越國境確保生存機會，也在與國家暴力對抗的同時，必須面對因女性身分而受到來自父權的宰制。

關鍵詞：跨國移動、國家暴力、父權、《桑青與桃紅》、《綠島》

i 本論文初稿宣讀於「2021 第十八屆全國台灣文學研究生學術研討會」(國立台北教育大學，2021.11.26-27)。蒙研討會評論人詹閔旭副教授、學報匿名審查委員惠賜寶貴意見，加深論文思考上的周延與縝密，謹此致謝。

ii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碩士生
來稿日期：2022.03.29 通過刊登：2022.09

Escape and Return :
The plight of Female Migration in Different Eras in
Mulberry and Peach and Green Island

Kao, Yu-Ting*

Abstract

This study examines how the literature on migration presents women's plight, using Gayatri Spivak's "negotiating the structures of violence" and Derrida's "supplement" to investigate the reasons why the identity of the protagonist in Hua-ling Nie's *Mulberry and Peach* and Shawna Yang Ryan's *Green Island* changes in movement. The reason for the growth backgrounds of the author, the differences in national violence, and the existence of family make different destinies and identities of the two protagonists.

Mulberry and Peach is written about the history from Chinese Civil War to White Terror, *Green Island* is written about the history from The 228 Incident to SARS, Although the two novels have been published 40 years apart when the protagonist in two novels faced wars and the threat of state violence, they resist the violence system through individual migration, and must face the patriarchy because of their female status.

Keywords : Migration, State Violence, Patriarchy, Mulberry and Peach, Green Island

* Master student, Graduate school of Taiwanese Culture,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一、前言

關於女性在歷史中的位置，女性主義者 Charlotte Gilman 這樣詮釋：「從有文字以降的這幾千年間，人類所擁有的，幾乎沒有例外的，都是『雄性本位文化』（Androcentric Culture）。」¹過往的歷史幾乎都是由男性記載，由男性建構屬於這個世界或某個國家的脈絡與細節。美國歷史學者 Lerner 也在 1969 年就指出這個問題：「有關女性歷史學最令人怵目驚心的事實就是一般歷史學家對女性的忽視。」²當女性在歷史中缺席，也就看不見 Gerda 所提及的：「在許多歷史上的大進展以及關鍵的轉折點，如同文藝復興、許多革命和戰爭以及工業化，對與婦女的影響與對男性的影響大相逕庭。」³在許多戰爭或歷史轉折中常常無法見到關於女性的記載，我們不清楚女性在這些事件中的經歷，自然也就被迫無視她們受到的壓迫與苦難。

若看不見女性在歷史中的位置以及女性對於歷史的詮釋，當這些歷史被以文學作為載體來呈現，也會落入相同的窠臼中：「不論中外，女性在父權歷史中的真正處境不是男性作家筆下的花玉，而是血淋淋的一堆碎屍，充滿生之幽怨，是『憂鬱帝國』的子民。」⁴如林幸謙所言，若女性在文學作品中的形象依舊是由男人對女人進行詮釋，女性真正的聲音即使是為了還原歷史進行的再現，也容易被男性的筆桿所形塑，因此我們更需要由女性來進行女性的書寫、創造女性的視角、呈現女性的故事。

聶華苓（1925-）的《桑青與桃紅》⁵（2020）藉由生於中國的女性主角，描述

¹ Charlotte Gilman 著，邵愛倫譯，《男性建構的世界：我們的雄性本位文化》（台北：暖暖書屋，2020），頁 27。

² Gerda Lerner, "New Approaches to the Study of Women in American History",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3:1 (Oct., 1969), p. 55.

³ 陳建守編，《時代的先行者：改變歷史觀念的十種視野》（台北：秀威資訊，2014），頁 310。

⁴ 林幸謙，〈張愛玲的臨界點：閨閣話語與女性主體的邊緣化〉，《中外文學》24 卷 5 期（1995.10），頁 104。

⁵ 此處使用之《桑青與桃紅》為時報出版於 2020 年出版之版本，此版相較於 1988 年與 1997 年之前二版本更為完整。關於版本差異之詳細說明，參見朱宥勳，〈紀念碑等級的台灣小說：朱宥勳讀

其因戰爭之故，為了生存不斷進行移動；楊小娜（1976-）《綠島》（2016）則描寫國共內戰結束後轉往台灣的國民黨，對台灣人民的暴虐與蠻橫導致了二二八事件，作為主敘述者的女主角則一生都活在國民黨政府的政治暴力陰影下。

兩部作品皆是由女性作家，藉由女性做為主角進行歷史的描繪與詮釋，在戰爭下女性通常容易陷入所謂的「雙重壓迫」——在父權社會中女性容易受到性別權力位階壓迫，而在戰爭之下，儘管國家暴力是無差別壓迫所有人，但女性亦同時接受來自國家與家庭結構中的複數暴力。

過去在討論《桑青與桃紅》及《綠島》這兩部作品時，研究數量上因為出版年代的先後有著顯著差距。《桑青與桃紅》由於小說本身所涉及的議題十分廣泛，涉及從生命書寫、創傷敘事、空間、華美文學、女性文學或是性別認同等不同面向的討論，也因此有相當豐富的研究數量，本文將聚焦於與研究有較直接相關的論文進行討論。

郭淑雅在〈「喪」青與「逃」紅？——試論聶華苓「桑青與桃紅」／國族認同〉，提出小說內容與作者生命經驗重合之處，意圖以聶華苓在《自由中國》時期受到的思想薰陶，對照其如何將虛無的國族認同表現在作品中。但其將桑青不斷的移動視為一種對國族認同的疏離反應，⁶然而在原生家庭無法存活、需要「逃」才能保存沈家香火、在台灣躲避通緝的過程中種種異常壓抑的描寫，其實皆為國家戰亂下的影響，也是桑青在國族與父權雙重壓迫下轉變為桃紅的原因。

黃儀冠〈鄉關何處——論《桑青與桃紅》的陰性書寫與離散文化〉中，從陰性書寫的角度切入，與離散並論作品中如何呈現國族論述與性別意識，並以此開啟女性書寫的新格局。只是對於轉變為桃紅的敘述，黃儀冠直接認為是：「桑青轉變成自由自在的桃紅，學會飛翔的能力與生存的價值，跨越父權壓迫的束縛，向外尋求

聶華苓《桑青與桃紅》，（來源：<http://www.unitas.me/?p=12628>，2020.12.18 瀏覽）。

⁶ 郭淑雅，〈「喪」青與「逃」紅？——試論聶華苓「桑青與桃紅」／國族認同〉，《文學台灣》32 期（1999.10），頁 265-266。

自我重生及廣闊的天空。」⁷但關於桑青轉變成桃紅，以及桃紅之於父權體制的相關討論，陳佳紋與黃素卿都各自在其論文中提出與黃儀冠不同的看法。

陳佳紋〈論《桑青與桃紅》中的女性意識與歷史書寫〉思考是否透過最後的精衛填海神話，來隱喻桃紅的抵抗徒勞：「縱然自女神神話中誕生的桃紅擁有女性無以制衡的強大力量，但以桃紅如此微小而孤獨的女性語言與身體，是否真能將桑青溺斃的傳統、語言、歷史、政治等無邊無際的父權之洋填平？」⁸黃素卿更在〈華裔離散族群意識及華裔移民認同：《桑青與桃紅》和《千金》〉進一步指出：「因為女人在民族／國家裡的社會與法律地位多還是由她們與男人之間的關係來界定，她最後流離無根的狀態還是意味著女人屈服於民族／國家之下。」⁹桃紅即便想在美國落地生根（申請永久居留權），卻因不被接納而只能選擇以游擊般四處奔逃的方式在美國的土地上生活下去。馮品佳〈鄉關何處？：《桑青與桃紅》中的離散想像與跨國移徙〉則延續黃素卿關於桃紅在美國的討論：「小說非常重要的一個層面就是漂泊離散的中國女性如何變成了華裔美國人。」¹⁰強調四處流浪與在地圖上留下地名標記，皆是為了創作「在地性」與歸屬感。

黃湘玲的碩士論文《國家暴力下的女性移動敘事：以聶華苓《桑青與桃紅》、朱天心〈古都〉、施叔青《風前塵埃》為論述場域》¹¹，則是將《桑青與桃紅》與其他兩部作品一同放在論述國家暴力的框架進行討論，兼論女性在其中的位置。黃湘玲的研究側重於女性如何在被壓迫而移動的過程，個體與國家權力網絡的關係，本

⁷ 黃儀冠，〈鄉關何處——論《桑青與桃紅》的陰性書寫與離散文化〉，《政大中文學報》1期（2004.06），頁300。

⁸ 陳佳紋，〈論《桑青與桃紅》中的女性意識與歷史書寫〉，《中文研究學報》3期（2000.06），頁161-162。

⁹ 黃素卿，〈華裔離散族群意識及華裔移民認同：《桑青與桃紅》和《千金》〉，《中外文學》34卷9期（2006.02），頁245。

¹⁰ 馮品佳，〈鄉關何處？：《桑青與桃紅》中的離散想像與跨國移徙〉，《中外文學》34卷4期（2005.09），頁105。

¹¹ 黃湘玲，《國家暴力下的女性移動敘事：以聶華苓《桑青與桃紅》、朱天心〈古都〉、施叔青《風前塵埃》為論述場域》（台中：國立中興大學台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

文則更關注女性與國家及父權社會角力的過程中，自身的身分認同是如何在當中進行解構與不再建構。

楊小娜《綠島》的前行研究與相關討論目前仍不多，丁威中與陳怡蓁的碩士論文¹²皆以白色恐怖受難者與二二八事件見證者如何在作品中被呈現為討論核心。前者認為《綠島》的寫作推動了未竟轉型正義的實踐，並以後記憶對抗戒嚴時代的歷史失憶，為台灣人與台美社群發聲。後者則同時也討論女性在歷史中的位置：「在 1945 年後，無論是母親還是主角都變成了白色恐怖受難者的妻子，她們在當中的精神創傷，跨世代的相遇、衝突與周旋，都該被視為國家暴力的遺緒。」¹³透過小說中的母親與主角分別做為敘事主體，以女性視角從另一個角度詮釋日治時期及國民政府的國家暴力如何對家庭施壓，並以此重構台灣女性於歷史中的主體性。劉威廷更進一步將《綠島》放入華語語系的框架下討論，¹⁴觀察文本中的多語語系背後連帶的台灣國族歷史，並探究英語和中文譯本上的翻譯落差。

從兩部作品的前行研究中，能明顯看出《桑青與桃紅》及《綠島》皆描寫女性受到雙重壓迫結構，並在（跨國）移動中不斷對自我認同進行思考，但在小說結局上前者選擇了一種「在路上」的持續移動狀態，後者卻選擇回歸家庭。《桑青與桃紅》在過去的討論中，因為中國出生、先到台灣再到美國的移動敘事以及擁有同樣經歷的聶華苓之緣故，通常會放在華美文學的框架下思考，被視為書寫中國人遭到集體放逐的悲劇；¹⁵但楊小娜則多次強調《綠島》是寫給台美人的故事：「這本書也

¹² 丁威中，《對抗歷史失憶：楊小娜的《綠島》》（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英語學系碩士論文，2020）；陳怡蓁，《跨世代的主體性追求：楊小娜《綠島》之中的抗拒與共謀》（台北：國立台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9）。

¹³ 陳怡蓁，《跨世代的主體性追求：楊小娜《綠島》之中的抗拒與共謀》，頁 65。

¹⁴ 劉威廷，〈台灣重層語系研究——以《綠島》及其翻譯交涉為例〉，《彰化師大國文學誌學》40&41 期（2020.12），頁 79-108。

¹⁵ 簡政珍，《放逐詩學：台灣放逐文學初探》（台北：聯合文學，2003），頁 14。黃秀玲也提及在多數中英文評論中都將此書是為一種中國／中華民族的預言。參考自：黃秀玲，〈文本跨界之得失：以中國中心、亞裔美國和女性主義的批評實踐來看聶華苓的《桑青與桃紅》〉，收入單德興編，《華美：華美及離散華文文學論文集（下）》（台北：允晨文化，2020），頁 522。

要獻給這一代的台美人，他們在戒嚴令的陰影下成長，但從未失去他們對追求更美好世界的願景信念，持續為了台灣的國際認同奮鬥不懈。」¹⁶「台美人」的概念是在 1970 年代才出現的詞彙，用來表示自我認同為台灣人的美國移民，形成原因則與當時的國際政治、台灣內部政治及在美台灣人的台獨運動等互相牽涉而成。¹⁷劉威廷亦特別點出：「台美人（特別是第一代）可以說在強調二二八事件的政治光譜上相異於華美人（以 1949 年外省族群與留學生為主）的離散敘事。」¹⁸女性主角選擇的背後牽涉到國族身分與政治社會環境的不同，也呈現出華美人及台美人離散敘事上的差異。

本文將以《桑青與桃紅》及《綠島》兩部作品作為探討中心，先論述其中的國家暴力與父權如何形成雙重壓迫結構，接著分別佐以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的「與暴力結構協商」(negotiating the structures of violence)以及雅克·德希達(Jacques Derrida)的「增補」(supplement)兩概念，透過相關細節耙梳，呈現兩部作品中女性主角的身分認同如何在壓迫中產生變化，以及「華美人」與「台美人」兩種不同的身分背後所帶給她們的相異歷史經歷，¹⁹最終導致認同與結局上的差異。

二、《桑青與桃紅》：華美女性移動中的認同與「家」「國」協商

《桑青與桃紅》於1970年代初期連載便因政治及尺度問題被腰斬。關於這部作品面臨的種種阻礙，寫作當下人在美國的聶華苓直言：「這小說寫的不是政治，寫的是『人』。『人』不要政治，政治偏要纏他，擾他，整死他。」²⁰她一生顛沛流離，在中國時為了躲避抗日戰爭到湖北避難，而後因為國共內戰在1949年隨著國民黨

¹⁶ 楊小娜，《綠島》（台北：時報文化，2020），頁 528。

¹⁷ 會於第三節與小說內容進行詳細對照討論，相關論述可參考：許維德，《族群與國族認同的形成：台灣客家、原住民與台美人的研究》（台北：遠流出版，2013），頁 370-383。

¹⁸ 劉威廷，〈台灣重層語系研究——以《綠島》及其翻譯交涉為例〉，頁 86。

¹⁹ 此處關於兩本小說中分別呈現華美女性與台美人女性離散敘事的思考觀點，來自審查委員的提點與啟發，在此致謝。

²⁰ 聶華苓，〈桑青與桃紅流放小記〉，《桑青與桃紅》，頁 319。

來到台灣，卻又因白色恐怖使其任職的《自由中國》被迫停刊，最終藉由與保羅·安格爾（Paul Engle，1908-1991）的婚姻遷移至美國定居。這與書中的主角桑青十分相似，因為外在國家暴力必須一再移動，一方面承襲華美人離散中受政治情勢與戰爭導致被迫離開中國本土的書寫，同時也展現出因為女性身分所受到另一層壓迫，身分認同也在過程中逐漸鬆動，最終導致代表另一種認同形象的「桃紅」誕生。

Spivak認為女性在這樣的暴力結構中需要「與暴力結構協商」（negotiating the structures of violence），並提到當主體性透過完全不對等的社會力量建構而成時，兩股力量會彼此互相協商。身為弱勢者的女性要以此在主流社會中撐開能作為容身之處的空間，父權社會則為了其自身的穩定運作不得不參與協商。本節將以此討論桑青一再以逃離／移動，作為與國家及家庭的父權暴力協商的方式，這個過程中的失敗也影響了她在國族及自我認同上的建構。

（一）中國時期：女性的家庭認同歸屬矛盾

小說中桑青的第一次移動是出自於對家庭父權結構的不滿，家中只傳男性的玉辟邪象徵著父權傳統，身為女性的桑青連被碰觸都不允許，但保管這塊玉的角色卻是母親，藉由老史口中提到的父親形象則是溫文孱弱的：「你爸爸連個老婆都管不了，由她作威作福，他就帶著一頂綠帽子在書房打坐！……你自己說的，你爸爸當軍閥時候打仗傷了要害……」²¹男性生殖能力的受損以及不符合父權社會中對男性個性的期望，使時常施暴的母親成為家庭中的主要掌權者，桑青在與美國移民局的對話中，也提到自己與弟弟的離家皆是因為待在家中感到難以生存。²²偷走玉與逃家是她試圖與家庭父權進行協商，但她並非要拒絕或從家庭關係中脫離，甚至到上船前一刻仍有返家念頭，²³顯示出家庭作為桑青唯一的情感關係連結有重要的歸

²¹ 聶華苓，《桑青與桃紅》，頁 24。

²² 聶華苓，《桑青與桃紅》，頁 244。

²³ 聶華苓，《桑青與桃紅》，頁 24-27。

屬感存在，在轉變成桃紅前她也一直都在力保擁有家庭關係。

船上所有人都是為了個人目的前往重慶，只有桑青是為了離開家中而跟隨史丹上船。擱淺在瞿塘峽上動彈不得的船形成一個閉鎖空間，屬於國家的法與傳統道德逐漸失去作用，最初船上分開活動的三男三女，到後期從賭注開始引發混亂的肢體接觸：

桃花女躺在鋪上餵孩子奶。留學生點燃一支菸，抓起桃花女右腳，把菸插在她兩個腳趾之間，點燃的一頭冒在腳背上，他就臉貼著她腳板心抽菸，兩手捧著她的腳。

老先生在桃花女左腳上也抽起菸來。

桃花女四仰八叉地躺著，孩子趴在她的奶子上吸得叭叭響；兩個男人捧著她的腳抽得叭叭響。²⁴

但國家律法的消失並不代表父權結構的瓦解，相反的更能從六人在船上的互動中一再看出父權的現形。不只是最初老先生口中嚷嚷著傳統倫理道德與歷史，在決定賭注的籌碼時，同樣賭的是家當，老先生的四合院房子被認為有價值，桑青的祖傳玉辟邪卻被流亡學生說：「我寧可要你這個人！」²⁵桃花女也被認為身體比起兒子更有成為賭注的價值。除了對於重要之物的認知不同外，後來裂成兩半的玉辟邪，除了象徵著桑青打破家庭中的父權結構外，也代表在父權思想中認定身體才是作為女性的價值存在，傳家之寶的作用自然被無效化。同樣的老史要求流亡學生穿女裝唱鳳陽花鼓，也是一種性別的向下流動（Down Mobility），打破男性在父權社會中被期待的陽剛氣質，視其陰柔化為一種嘲弄。最後船在抗戰勝利的同時擺脫擱

²⁴ 聶華苓，《桑青與桃紅》，頁 89。

²⁵ 聶華苓，《桑青與桃紅》，頁 82。

淺，停在仍身著女裝的流亡學生敲著響鼓的描寫，也隱喻即使戰爭結束、即使船前進了，已經被破壞過的家國律法卻不會回到原本的樣子，也包含桑青的玉辟邪和已經發生過的性經驗。

桑青只隱晦的以回憶的方式提及放走弟弟到北平及進入父親書房，但桃紅則直接在給移民局官員的信中寫道：「她在抗戰勝利後從重慶回到她老家南京。」²⁶抗戰勝利後國家鞏固住了，因此桑青也該回家「鞏固住」家庭，這背後其實也是家庭父權結構與桑青的「協商」，她並沒有因為偷走甚至摔碎祖傳玉辟邪而被趕出家門，顯示出父權為了維持家庭完整性做出讓步，而桑青則再度回到這個結構中。只是隨後發生的國共內戰再度影響她的家庭，弟弟離開家庭加入共產黨，父親則因無法接受弟弟的決定而自殺，家庭因為國家政治的動盪瓦解，桑青選擇前往北平投靠家綱，憑著幼時的金鎖要與他結婚，欲在戰爭動亂下尋求新的安身處，只是組成家庭的同時桑青又再度遭到家庭中的父權結構束縛。

桑青說：「我在沈家仍然是個外鄉人。」²⁷婚前初到沈家便因南北方傳統習俗差異產生格格不入感。家綱與杏杏有染，沈母卻告訴桑青：「他規規矩矩，是你福氣。他不規矩，你心裡有數也就不那麼苦了。」²⁸把家綱的不規矩稱為是要「做男人」，反過來指稱桑青有剋父、剋母、剋夫、剋子的毛病，²⁹詢問家綱是否能夠接受，直接壓低桑青在婚姻關係中的位階，家綱則在新婚初夜發現桑青早已與他人發生過性關係，他曾夢到兩人在白淨的天壇上交媾，當中隱含強烈的處女情節價值觀。但兩人都未捨棄這段婚姻關係，也是出於鞏固家庭進行的協商，桑青為了保全委身之處，家綱則帶有母親一再提及要傳宗接代的需求，兩人也為此才決定移動到台灣，整路上家綱反覆的提自己想要兒子，並要求桑青「只准生兒子，不准生女兒。」³⁰

²⁶ 聶華苓，《桑青與桃紅》，頁 20。

²⁷ 聶華苓，《桑青與桃紅》，頁 117。

²⁸ 聶華苓，《桑青與桃紅》，頁 126。

²⁹ 聶華苓，《桑青與桃紅》，頁 133。

³⁰ 聶華苓，《桑青與桃紅》，頁 160。

對於女性身體的控制與重男輕女的父權思維再度顯現。

從桑青在中國的幾次移動經驗，可以看到除了第一次是為了表達對家中重男輕女傳統觀念的不滿外，其餘兩次皆是為了躲避國家暴力以維持家庭的存在。但無論是有歸屬感的原生家庭，或是在戰爭下有安身處的婚姻關係家庭，也都因為桑青的女性身分產生矛盾，她雖厭惡家庭中的父權制度，但也需要家庭帶給她的歸屬認同，因此在無法澈底解構父權的情況下，只能不斷與其展開「協商」，同時父權結構也為了能夠持續穩定運作而願意與桑青協商，「容忍」她對傳統觀念的反抗，或是未遵守女性婚前守貞的規矩。

（二）台灣時期：家庭作為認同歸屬的瓦解

移動到台灣原是為了保護家庭，但因家綱虧空公款被通緝，一家人只能委身於蔡叔叔家的閣樓。小說也隱晦描寫 1950 年代進入白色恐怖時期台灣壓抑的氛圍：「在閣樓時間沒有用。鐘停了世界就停了。」³¹警察不定時的戶口盤查，導致桑青一家即使藏身於閣樓也需要低伏著身子生活，生活感消失於一再重複的時間內。

雖然是家綱犯罪，桑青卻帶著女兒桑娃一同躲藏，從她一再向家綱表明希望對方不要去自首、願意一起一直留在閣樓，甚至若要離開閣樓也想一起自首，³²都能看出她對於保有家庭的渴望，比起婚前或剛結婚時更對於與家綱共組的家庭產生歸屬感。但家綱卻無法忍受長時間處於閉鎖狀態的閣樓，將一切怪罪給桑青：「他抱怨他的一生毀在我手裡。他娶了個破罐子。他對我幻滅。」³³家綱認為因為桑青不是處女、讓他在新婚夜先開了口而註定倒楣一輩子：「他挪用公款只是為了家累。他若單身就是一個清白人。就是犯了法也可以偷渡出境。」³⁴、「他若是抓進牢裡我

³¹ 聶華苓，《桑青與桃紅》，頁 180。

³² 聶華苓，《桑青與桃紅》，頁 172-173、176-177、184-185。

³³ 聶華苓，《桑青與桃紅》，頁 208。

³⁴ 聶華苓，《桑青與桃紅》，頁 189。

母女倆如何活下去。」³⁵兩人的想法同樣都是為了避免家庭分崩離析，但家綱的思考中顯露了強烈的父權思維，削弱桑青對於繼續鞏固家庭的想法：

我告訴蔡叔叔我要過正常的生活。白天出去。晚上回家。

他認為那樣不妥。我在白天露面對人就是個威脅。因為我是逃犯的妻子。

那才公平。我告訴他。我一直在威脅中過日子。他們也該受點威脅。³⁶

她成了蔡叔叔的情婦獲得離開閣樓的自由；她不僅自己走出閣樓，也帶女兒桑娃走出閣樓。率先走出閉鎖空間的是女性（儘管協商付出的代價是肉體，且這裡與本節第一部分論述的船中空間相同，再次彰顯在父權社會中對女性肉體的價值認知），留在閣樓裡的男性則呈現無用形象：「家綱每天睡二十小時。嘮叨四小時。不嘮叨的時候就蒙著被子手淫。」³⁷家庭在桑青的心中逐漸幻滅，她不願意繼續委身於閣樓中，卻還要受到實質上犯罪的丈夫指責與責任歸咎。因此最後獨自離開閣樓的桑娃向前來查戶口的警察指認一家人的藏身處時，桑青並未猶豫直接說出家綱的全名間接舉報丈夫，也換取她與女兒桑娃能夠離開閣樓的自由。

台灣時期可以看到桑青原先維持著與在中國時同樣維繫家庭的想法，但家綱的冷漠與怪罪讓家庭在桑青心中失去歸屬感，進而拒絕協商使家庭瓦解。

（三）美國時期：家庭與國家的雙重認同失根

移動到美國時桑青只有獨自一人，從她的自白中可以看到女兒桑娃已拒絕與她來往，³⁸她在美國也面臨來自國家權力的介入，當時美國藉由嚴苛的移民政策以

³⁵ 聶華苓，《桑青與桃紅》，頁 202-203。

³⁶ 聶華苓，《桑青與桃紅》，頁 213。

³⁷ 聶華苓，《桑青與桃紅》，頁 218。

³⁸ 聶華苓，《桑青與桃紅》，頁 258。

排除在政府眼中「不受歡迎的移民」(undesirable immigrants)，³⁹桑青被安上(外)字八九——七八五——四六二這串編號，取代在美國人眼中難以發音的本名，也因曾經有過通姦紀錄而以繼續調查為由，暫時被拒絕通過美國永久居留的申請，是一個「非法」的外國人，並被通知要更進一步的調查以便確認是否需要驅逐出境，顯示了桑青欲在美國落地生根的意圖及困難。

可能無法待在美國的危機、若被驅逐出境回到台灣後也只剩下無法恢復的破碎家庭，更不要說作為出生地卻不可能回去的中國。幾乎是三重失根的流離失所感讓「桃紅」的人格與意識開始出現在桑青體內，到後期幾乎占據整個美國時期的主述者位置，且展現與桑青完全不同的態度。桑青內心仍渴望建立家庭並產生聯結，為此她已於此前極力鞏固原生家庭與婚姻關係家庭，一再與其中的父權體制進行協商、甚至妥協，尤其對桑青來說自己在美國是一個「絕路的外國人」，⁴⁰沒有任何能夠成為歸屬感的來源，甚至在國家認同上身為中國人也要承認效忠美國(且也回不去真正效忠的出生地)，使她不願意在無法建立家庭的情況下生下小孩。但江一波為了美國的生活拒絕與現任妻子離婚，過去一再失敗的家庭關係也讓桑青無法再與人建立家庭。桃紅則不將家庭視為必要，不斷擾亂桑青的墮胎計畫也要保住小孩，在江一波因為妻子死後反過頭來要求留住「他的」孩子時和對方說：「你用實驗管造個孩子吧！」⁴¹她不需要家庭，自然也沒有必要進行「協商」。桃紅在此協商的對方反而是代表國家權力的移民局，亦如黃秀玲援引劉大偉對離散及族裔認同的研究來討論桑青／桃紅與美國的關係：「離散主體置身於新的社會政治範圍中，便必須委身於時間性與歷史性……移民局的盤問點出國家介入種族主體的建構，也證明國家需要將逃逸的主體再收回，納入它的政治領域內。」⁴²桃紅與代表移民

³⁹ 廖元豪，〈移民：民權的漏洞，還是民權的延伸？——評介 Kevin R. Johnson 的 The “Huddled Masses” Myth: Immigration and Civil Rights〉，《台灣社會研究季刊》61 期（2006.03），頁 419。

⁴⁰ 聶華苓，《桑青與桃紅》，頁 311。

⁴¹ 聶華苓，《桑青與桃紅》，頁 315。

⁴² 黃秀玲，〈文本跨界之得失：以中國中心、亞裔美國和女性主義的批評實踐來看聶華苓的《桑青

局的官員之間，可以說就是一種弱勢者與掌權者彼此協商的縮影，桃紅對移民局官員的盤問感到厭煩，但她仍要待在美國，因此選擇不斷在美國境內移動，並同時將各種桑青的日記及私人書信寄給移民局官員來回應對桑青的調查。桃紅將代表國家的力量反過來玩弄於掌心、不再需要家庭的同時也代表捨棄了做為歸屬感的國族認同必要性，但回到 Spivak 在討論協商概念時舉例到：「像是女性主義必須要與陽具中心主義互相協商，因為那結構成就了今日的我們。」⁴³在此權力結構外，別無他處。桃紅再怎麼樣奔逃依舊是在美國領土內，亦即在權力結構當中，雖然她完全可以不建立婚姻關係來拒絕回到由父權宰制的家庭，卻無可避免美國移民局的持續追查，桃紅在路上（on the road）的狀態反過來說，也正是由國家力量的壓迫所造成的行動。

《桑青與桃紅》呈現了桑青從中國、台灣到美國的移動過程，也是她轉變至桃紅的過程。可以看到在小說中「家」對於桑青的重要性，國家權力以暴力的方式毀壞家庭，她為了獲得待在其中才能擁有的歸屬感，一再與父權結構協商或妥協。這個「家」同樣能夠上升到國家的層次，桑青因為戰爭的關係失去原生家庭的同時也被迫離開出生地，成為 1949 年來台外省人的其中一員，但家庭在台灣再次崩毀連帶無法形成對台灣的歸屬感，當美國移民局問桑青若被遞解出境願意去哪裡，桑青回答不知道，移民局官員說：「中國人是沒有地方可遞解的外國人」⁴⁴正反映了桑青在內的一代有同樣由中國、台灣到美國移動敘事的中國人，正如小說中桑青／桃紅在美國交好的男性們，無論是剛來到美國時對中國文化不屑一顧，定居後卻對與中國有關一切產生強烈歸屬感的江一波；或是直言在台灣或留在美國都無所適從，想回中國為國家工作的鄧志剛；在他們身上都能看見「遠距民族主義」

與桃紅》》，頁 534。

⁴³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Negotiating the Structures of Violence?," in Sarah Harasym ed., *The Post-colonial Critic: Interviews, Strategies, Dialogues* (New York: Routledge, 1990), pp.147.

⁴⁴ 聶華苓，《桑青與桃紅》，頁 279。

（Long-Distance Nationalism）的影子，⁴⁵與母國產生的距離使民族主義增生，身為中國人的認同因此更加強烈。只是桑青被迫在獲得認同歸屬的同時也得陷入父權結構中，終究使她在轉變為桃紅後不願再單方面承受壓迫，不進入家庭婚姻關係的同時，也必須以不斷移動的方式與強勢的國家權力協商，產生與其他男性在美中國人不同的結局，更凸顯女性身分在權力結構中的弱勢。

三、《綠島》：台美女性的階段性認同變化

《綠島》有別於聶華苓書寫《桑青與桃紅》時許多從生命經驗提取的記憶，1976年出生於美國的楊小娜未經歷過二二八與白色恐怖，是在成年後到台灣時參觀二二八紀念館，發現這段在美國未有人記敘的歷史才決定進行創作。除了以較少人描寫的倖存者與受難者家屬角度切入，她也特別強調《綠島》是一本女性小說，以及女性在政治事件或政治運動中也需要被看見的重要性：

希望能夠探索性別意識中各種微觀與巨觀的權利侵害，像是不能接受教育、在談話中要閉嘴等等，「況且，在台灣民主運動與二二八事件中，女性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⁴⁶

楊小娜正是要打破本文於第一節所提及的，因為女性在歷史中的位置常因由男性觀點出發的歷史紀錄而被忽視，她透過許多只有女性可能面臨到的困境，細微描寫《綠島》中出現的女性們。

作品以二二八事件發生當夜誕生的主角開始，一路描寫國家機器的暴力威脅是如何置入她的人生中，甚至離開台灣到美國仍如影隨形。與《桑青與桃紅》的情

⁴⁵ 此處關於「遠距民族主義」的思考觀點，來自審查委員的提點與啟發，在此致謝。

⁴⁶ 阿潑，〈一個台裔美國作家眼裏的二二八——《綠島》作者楊小娜其人其書〉，（來源：<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60804-taiwan-228/>，2020.12.18 瀏覽）。

況相同，《綠島》的主角同樣也受制於來自國家暴力與家庭中父權結構的「雙重壓迫」，然而她最後並未像桃紅般逃跑或離開，其中「台美人認同」的形成以及相異時代所造成的歷史經歷不同，都使《綠島》的主角最後選擇回歸家庭。

Derrida在回應Rousseau對於言說及書寫關係的思考時，提出對其中「補充」概念的不同看法。盧梭承襲邏各斯中心主義的言語中心主義（phonocentrism）思想：「主張言語與存在的意義絕對貼近。」⁴⁷認為言說才能直接表達思想，書寫充其量只是言說的補充。但Derrida反而指出：「我們迫切需要用文字來補充語言。」⁴⁸認為書寫與言說同等重要，且書寫的補充作用更是一種「增補」，同時是空缺的補充也是替代，並產生正文以外的意義及作用。

本節將使用Derrida的增補概念來討論《綠島》主角的認同變化，從最初對黨國給予她的大中華思想深信不疑，到被在美國留學任教的林偉告知黨國的真相，婚後移動至美國定居又恰逢台美人的海外台獨運動興盛時刻，這些「增補」的過程都讓主角的國族認同產生變化。在過程中除了能看到與《桑青與桃紅》裡桑青同樣的國家暴力與家庭父權結構雙重困境，也能看到在同樣困境下的不同結局選擇。

（一）初期黨國思想塑造

主角從出生後就因處於二二八事件期間未在第一時間取名字，整本小說中也一直是「無名」的狀態，呈現政治壓迫對其長遠影響，以及因女性身分被要求在事件中順從或隱身的消音狀態。

她最初的認同是由國民黨政府的黨國教育帶來的：「我開朗順從，被塑造成一個乖女孩跟好公民。」⁴⁹戒嚴時期的社會氛圍緊繃，政府不允許任何可能有差錯的人民存在。主角與最初在中國時的桑青不同，出生成長於中國的桑青並沒有認同的

⁴⁷ 雅克·德希達著、汪家堂譯，《論文字學》（上海：譯文出版，1999），頁15。

⁴⁸ 雅克·德希達著、汪家堂譯，《論文字學》，頁208。

⁴⁹ 楊小娜，《綠島》，頁87。

問題，即使國共內戰並未加入共產黨並離開中國，但她心中仍有身為中國人的認同；《綠島》的主角卻是活在國共內戰後退居台灣的國民黨，向人民說出：「總有一天我們會『收復』中國大陸，統一之後，全國就會再次過著幸福快樂的生活。」⁵⁰的政治宣傳中，並用各種手段形塑台灣人的歷史記憶與認同，如主角在學校教育中學習五千年的中華歷史、唱國歌升國旗、不准講台語等，且白色恐怖下的家庭也對在二二八事件中被抓走的父親絕口不提，使她全部的思想認同都來自國家權力的塑造。但同時也能看到這種中華認同思想的不穩固性，縱然對二二八或更之前歷史未有深刻印象的孩童能接受吸收，但經歷過政權轉換與日治時期的長輩們則有不同看法：

「中國沒搞懂的是，」叔叔當時說，「中華民國才是中國的合法統治者。扛著共和國大旗的可是我們。我們是流亡在外的政府！」
外公猛拍桌子。「你被洗腦了！台灣是屬於台灣的！」⁵¹

但即使後來她被教會「分辨」台灣人與中國人的不同，也因為對台灣歷史知識的空白未能產生更多感受：「對我來說，人就是人。」⁵²也因此在被黨國關了十年的父親回到家中後，她無法理解父親對周遭一切的恐懼與猜忌，更沒有關於父親在那之前仍是一個溫文儒雅知識份子形象的記憶。主角一度也受不了而「逃家」，但相對於桑青十六歲時有足夠的知識與資本能夠離家，年僅十一歲的主角只有辦法進行狹隘的小規模出走：

我沒有想到自己要在哪裡過夜，只是一心想要離開。我發誓再也不回去。

⁵⁰ 楊小娜，《綠島》，頁 87。

⁵¹ 楊小娜，《綠島》，頁 98-99。

⁵² 楊小娜，《綠島》，頁 143。

家庭。

那個字眼毫無意義，只是編故事的人跟政府裡的人販賣給我們的夢想。⁵³

她沒有目的、資本，更沒有足夠多的知識生存，最終跟桑青一樣回到家庭，離家與返家的過程中甚至只有繞行住家附近的田野。如果說桑青面對的是原生家庭中亙古的重男輕女式父權，《綠島》的主角則是在國家暴力下使她的家庭從無父狀態，到要面對父親古怪暴戾的性格，這種暴戾也是黨國在父親身上的遺緒，間接造成家庭內部的破壞。

（二）台灣意識的啟蒙與增補

主角成年後仍維持著在黨國教育下學到的思想與認同，直到母親為他找了舊識家的兒子林偉做為相親對象，林偉就像當時台灣大多數的男性知識份子一樣，加入美國留學生的風潮中，台大畢業後在美國攻讀碩博士，打算在當地任教定居。朱芳玲指出台灣的留美熱也與人民當下的國族認同有關：

當時外省族群無法認同狹小邊緣化的台灣，本省族群也在政權不斷更迭的主體分裂下，歷史、語言都失了根。本省、外省兩大族群的碰撞凸顯了文化的斷裂，此時加上西方文化思潮的強烈衝擊，不論本省或外省都失去了國族認同，於是許多知識份子開始「出走」。⁵⁴

在美國的林偉不像待在封閉島內的主角，他熟知台灣的歷史與國民黨的政治暴行，初次見面時便以有些粗暴的方式，為主角「增補」那段對於台灣歷史的空白與缺少：「耳聞這個故事以前，這個事件根本不存在。島上的每個人各個陸續有過相同

⁵³ 楊小娜，《綠島》，頁 164。

⁵⁴ 朱芳玲，《流動的鄉愁——從留學生文學到移民文學》（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2013），頁 14。

的體驗：一個結構體突然爆炸，轟進我們原本平靜空蕩的歷史平原。」⁵⁵主角對相關說法半信半疑，但這也是她第一次意識到自己的歷史認知中有大量的缺失。

林偉作為主角台灣意識萌發的增補者、啟蒙者，同時也是家庭父權結構中的得利者。在雙方父母第一次將兒女介紹給對方認識時，說林偉正在美國頂尖大學攻讀物理博士、台大畢業、會說四國語言，但主角母親強調她的優點卻是「有寫作天分、擅長理家、對孩子有耐性、對數字很有辦法」，⁵⁶顯示出父權社會下以「賢妻良母」作為對女性的評判標準。⁵⁷台灣社會的賢妻良母觀最早建立於日治時期，日本政府透過殖民地式的女子教育，期待台灣女性在家庭內能夠完成「以處世之才補男子未逮之處」的責任與義務，⁵⁸中國則在 1905 年後開始出現於文獻資料記載，⁵⁹也不外是期待女性要同時擁有內涵與持家的能力。主角被規定一個月內就要結婚，否則就是「沒人要的老處女，被迫嫁給美國人」，⁶⁰還沒有不結婚的選項，進入婚姻家庭被父權社會視為女性的必要條件，是否為自由戀愛或對彼此的愛情基礎有無都不是重點：

「林家是老朋友，他們是好家庭，小偉再不久就要拿到博士不然妳還有什麼機會可以去美國？等你到那裡，就有能力贊助外甥跟外甥女，這樣對大家都好。」所以她不打算勸退我。

婚姻向來是為了愛，可是有時候那份愛是為了家庭，而不是戀人。⁶¹

⁵⁵ 楊小娜，《綠島》，頁 368。

⁵⁶ 楊小娜，《綠島》，頁 173-174。

⁵⁷ 此處關於賢妻良母論述的增加，來自審查委員的提點與啟發，在此致謝。

⁵⁸ 洪郁如、吳佩珍著，吳亦昕譯，《近代台灣女性史：日治時期新女性的誕生》（台北：國立台灣大學出版中心，2017），頁 54-55。

⁵⁹ 陳姪媛，〈簡介近代亞洲的“賢妻良母”思想——從回顧日本、韓國、中國的研究成果談起〉，《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10 期（2002.12），頁 201。

⁶⁰ 楊小娜，《綠島》，頁 228。

⁶¹ 楊小娜，《綠島》，頁 235。

《桑青與桃紅》中桑青與家綱同樣也在沒有穩物愛情基礎的狀況下結婚，但桑青是為了獲得家庭中的歸屬感，但《綠島》的主角不是，她的婚姻是被決定的，是整個父權制度下認為女性需要家庭才能獲得歸屬感，而不是她自己的渴望。

（三）成為台美人——家庭與政治中的女性位置

結婚後主角隨著林偉來到美國，相較於桑青在經歷一系列國家定居與家庭的破碎後終分裂出桃紅的人格，她則是順利拿到移居許可的簽證，這也是在父權社會下，對於有家庭——有一個在美國接受教育多年並任教丈夫的已婚女性，比形單影隻的女性還要來得好確認其「安全」身分。主角也因為親眼看到林偉口中的國民黨惡行，而相信過去自己接受的黨國教育中有許多謊言與隱藏的錯誤：

美國校園裡滿是學生特務，他們從國民黨員那裡收受的賄賂有機票、秀場票券跟其他廉價的小玩意兒。只要在美國的紐黑文市說錯一個字，你在高雄的表親就會丟掉飯碗。會發生一連串事件，都不是偶然。在美國，我不再說自己是「中國人」，開始稱自己為「台灣人」。⁶²

於此同時在美國已經有台美人社群，他們除了強調自己的台灣身分外，也拒絕與認同祖國為中國的華美人被混為一談，許維德認為其中的原因包含政治與現實面向：「除了日常生活互動所造成的隔閡以外，台美人不願意被歸類為『華美人』的另一項重要現實考量，是『不和華美人區隔』會拿不到美國聯邦政府對少數族群的經費補助。」⁶³此外，知道國民黨政府政治暴行歷史的台美人們，更不願被歸類為國民黨政權自詡的「自由『中國』」的認同之下，1979 年後又因為美國正式宣布與中華民國斷交，並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使國民黨政府失去了宣稱自己為中國

⁶² 楊小娜，《綠島》，頁 258。

⁶³ 許維德，《族群與國族認同的形成：台灣客家、原住民與台美人的研究》，頁 372。

的正當性，也讓台美人組織發展更加蓬勃。主角從最初幼時對於中華民國的認同，歷經得知真相後的猶疑，一直到抵達美國後親眼看到黨國壓迫的事實與接觸台美人社群後，她的台灣人認同更進一步受到「增補」後才正式成形，也開始將這樣的觀念傳給下一代：

「我不是中國來的。」我當時說。

「可是阿嬤寄衣服來，箱子上面就是寫『Republic of China』（中華民國）！」
她堅持。

「對，是中華民國，不是中國。」

「可是箱子明明寫China。」

「我們是台灣來的」

「那他們幹嘛叫它China？」⁶⁴

但主角雖然有美國的合法居住權、大學教授的丈夫和兩個女兒的完美家庭，擁有桑青渴望的一切的她卻依舊沒有過得順遂。

同時擁有因二二八坐牢長達十年的父親以及在美國做台灣獨立地下運動的丈夫，這讓主角也發生像她知道的那些在海外做獨立運動的人會遭遇的事情，國民黨的特務陸愛國盯上她，遠在台灣父親表面上被國民黨政府羅織莫名的理由拘提，實則要求她交出美國家中藏匿的政治犯唐家寶手上那份，可能對國民黨政府不利的書稿：

妳知道吧，這樣我無能為力，除非妳願意幫我，否則我沒辦法幫妳。我已經
給了妳好些東西，我拿到什麼回報？這可不是慈善事業，也不算什麼友誼，

⁶⁴ 楊小娜，《綠島》，頁424。

而是生意上的交情。⁶⁵

在台灣遭遇的國家暴力並未隨著移動消失，在此主角也做了前一節Spivak所提的協商，以政治犯的書稿交換父親的釋放。⁶⁶只是實際上她在丈夫進行的政治活動中完全沒有發言權與決定權，當林偉表明要讓被政府通緝中的唐家寶藏身於家中，她表達的憂慮和擔心對丈夫毫無影響力。她看似參與其中，但一切都是由丈夫安排，包含被要求把唐家寶的書翻譯成英文、擔任司機載唐家寶去訪問退休的國民黨將軍以取得更多寫作資料，甚至是後來林偉決定為唐家寶舉行公開演說，或唐家寶決定搬離他們家，她都沒有任何能夠介入的餘地：

小偉、家寶跟他們一群朋友開始每週輪流到不同人家裡聚會——這種偽裝真的是一種策略，還是從電影學來的老套？參加的人一率是男性，女人除了供應脆餅或安撫孩子之外，不扮演任何角色。⁶⁷

婚前她就被期待以一個賢妻良母的角色進入家庭，婚後所有家事及照顧孩子的篇幅也都與主角有關，賢妻良母被要求有學識涵養，卻不是用來與丈夫有對等的商量地位，而是要負責孩子的家庭教育品質保障。小說中一個描寫全家人共同吃晚餐的場景，林偉玩笑般地說出：「我太太煮了一整天的料理，可是功勞最後都歸給我唷。」⁶⁸就像是主角在家庭關係中的縮影。

主角最後受不了這段婚姻關係而決定離開：「離開，離開就對了。在美國，妳可以離開。可以是一個離婚人士。」⁶⁹帶著女兒們住進旅館，但林偉打電話時只說

⁶⁵ 楊小娜，《綠島》，頁 389。

⁶⁶ 此處同樣適用於「協商」的思考觀點，來自審查委員的提點與啟發，在此致謝。

⁶⁷ 楊小娜，《綠島》，頁 342。

⁶⁸ 楊小娜，《綠島》，頁 344。

⁶⁹ 楊小娜，《綠島》，頁 374。

她是個糟糕的妻子跟母親，⁷⁰因為她並不是一個在婚姻關係中稱職的賢妻良母，她試圖插手「丈夫的事情」，但林偉沒有意識到「丈夫的事情」也是「家庭的事情」。同樣受制於婚姻家庭的父權結構，主角最後並沒有像桑青一樣成功脫離，促使她回歸的原因也是政治——唐家寶被國民黨特務殺害了，主角對家庭關係中壓迫的不滿在國家暴力之下變得不值一提，對於這場出走的結束只有主角對丈夫心懷愧疚的道歉，但林偉在情感上卻沒有同樣表現，像是反駁前面主角向自己喊話在美國可以離婚，因為在亞洲傳統社會裡擅自離婚或離家的女性是有問題的，而她們的丈夫不需要在其中負起任何責任。婚姻關係中林偉唯一一次道歉是因為外遇，但他道歉只是出自想卸下內心的罪惡感，這讓返家的主角第二次有離婚的念頭，母親則反覆勸告她不要離婚：「我們母女倆對愛的想法顯然不同；我看到的是獻身，她看到的卻是職責，我在乎人的感受如何，對她來說，人的作為才是關鍵所在。」⁷¹再次顯示出父權社會對家庭完整性的強調，只是主角已經失去對婚姻家庭的歸屬感而執意離婚，但第二次離婚同樣又是因為政治而未成功。

回到台灣後兩人在單獨出遊時被特務私下帶走刑求，主角吼說：「你們不可以這樣，他是美國公民。」⁷²如同陸愛國一開始找上她時主角也說：「我丈夫是美國人。」⁷³每當「美國公民」這個詞彙從主角口中出現，都是在必須抵抗來自國民黨政權的國家暴力時，對她來說雖然身為台美人，但台灣人才是認同，美國人只是生存手段。全美台灣同鄉會會長吳木盛（1933-）在自傳《鴨勇的腳印》中就說：「在當台灣人最後一代的子孫或台美人第一代祖宗的選擇上，好像台美人已選擇了前者。」⁷⁴台灣的成長經驗與和自己深切相關的台灣歷史，比不上雖然也定居了十年，卻連英文都還不特別流利的美國，這種互為因果的歸屬感與認同感，同樣展現在主

⁷⁰ 楊小娜，《綠島》，頁 383。

⁷¹ 楊小娜，《綠島》，頁 439。

⁷² 楊小娜，《綠島》，頁 462。

⁷³ 楊小娜，《綠島》，頁 262。

⁷⁴ 吳木盛，《鴨勇的腳印》（台北：前衛出版，2000），頁 374。

角最終放棄離婚思考的決定上：「我領悟到，這就是媽媽眼中的愛。共享的經驗、共享的歷史、共享的創傷：就是這個讓我們成為一家人，其他人都無法理解。」⁷⁵因為刑求導致流產的第三胎成為夫妻的共同創傷，過去林偉為電視中從事政治運動同伴的死亡悲傷時，主角很難用政治的角度去同理，就如同林偉無法同理主角對孩子會因為政治受到影響的憂慮，但藉由流產的第三胎讓他們真正能夠享有同樣的傷痛。值得注意的是，主角為已經是死胎的寶寶取了名字：「寶寶承接了這個名字、這段歷史。我們的兒子再也不是無名之人，他叫鈺。」⁷⁶對照出生時沒有取名字、也於書中處於無名狀態的主角，死亡的兒子卻擁有名字，還是出自於承襲父親的單名，背後除了顯示男性即使死亡也能被看見、被記住外，也隱約有一種父傳子的父權傳統在，更凸顯身為女性總是一再被迫缺席、隱身於歷史的大敘事中。就像即使父權的性別壓迫一再剝奪她在家庭的角色，但更巨大的國家暴力籠罩在上面，唯有一同經歷這些經驗的家人才能夠真正理解當中的傷害，反而將她推回父權結構並未消失的家庭中。

四、結語：戰鬥後的兩種選擇

本文以聶華苓的《桑青與桃紅》與楊小娜的《綠島》為例，指出女性在受到國家暴力的同時，也因為父權作用於性別上而產生所謂的「雙重壓迫」，並試圖透過兩部作品的耙梳，探究作品中女性主角在同樣受到雙重壓迫的情況下，卻產生認同上選擇分歧的原因。

《桑青與桃紅》中桑青面對的是大時代的動亂，她一再因為渴求家庭進行移動，但同時也正是因為沒有家庭而有移動的自由性，《綠島》的主角相較之下只能進行小規模的移動，無論是幼時騎腳踏車離家或婚後帶女兒離家出走，最後都因為家庭

⁷⁵ 楊小娜，《綠島》，頁 475。

⁷⁶ 楊小娜，《綠島》，頁 474。

的存在而歸返，父權社會對家庭完整性的要求一再對她進行召喚。國家暴力讓桑青被迫要在中國內陸逃竄、最後離開，國家的動盪使她需要建構家庭委身，家庭同時也作為歸屬感的所在，替代國家被動搖甚至失去的流離感，但女性的身分讓她同時也受到家庭中的父權結構壓迫，她不願意完全承受壓迫，也不願意失去唯一能產生歸屬感的家庭，因此只能試圖不斷與之協商。當家庭再也無法使她產生歸屬感的同時，桑青也面臨完全失根的困境，就如同許多華美人離散敘事一樣，她無法回到中國、也很難將台灣視為原鄉、又被拒絕安身在美國，在這些情況下出現的桃紅，雖然以狂放不羈的形象代替桑青掙脫父權社會的束縛，不再視家庭或國家認同產生的歸屬感為必要，但她仍存活於無法真正逃離的父權社會中，勢必要繼續與國家展開更多次的「協商」；《綠島》的主角雖然也因為國家暴力的關係使家庭遭受破壞，但並未像桑青一樣被完全破壞，且過程中主角的國家認同也未受到摧毀，只是隨著丈夫以及美國台美人的政治運動「增補」被黨國掩蓋掉的歷史而有所轉變，兩度想離開婚姻家庭也顯示她並不需要當中帶來的歸屬感。國家暴力作用的形式雖然不同，但都能看出兩部作品中「國家凌駕於家庭」的位階關係，國家暴力大於家庭、也大於家庭中的父權結構，因此在《桑青與桃紅》中國家暴力摧毀家庭，在《綠島》中則是一再顯示家庭問題在面對國家暴力時的不值一提。

相異時代的遭遇也是結局選擇差異的關鍵，桑青面臨的大多是會對國家存亡產生威脅的戰爭，1970年代在美國又因為單身女性的不明身分背景而遭到嚴格審查；《綠島》的主角則未經歷戰爭，取而代之的是更加明顯的國家暴力，儘管《桑青與桃紅》中也對台灣的白色恐怖時期有所描寫，但1949年後來台中國人的視角，與身為受害者的台灣人視角與細節描寫上仍有很大差異，主角到了美國也比桑青再晚了十年，恰逢台美人認同與台灣獨立聲浪高漲的時代，也深化主角的台灣人認同。華美人與台美人的身分背景與歷史經驗差異，都造成兩本作品中主角完全相反的認同，一個到最後完全失去也拒絕認同，一個則是更加鞏固了家與國的認同。

作者聶華苓與楊小娜，前者的人生經驗和《桑青與桃紅》有許多貼合之處，她一生都想逃離戰爭與威權政治的手，這種「逃」的意象也貫穿了《桑青與桃紅》的主軸；楊小娜則因為母親是台灣人，在發現這塊與自己有一半血緣相連的土地曾經有過一段她所不知道的殘酷經歷，決心透過回望歷史進行書寫，並希望能藉由《綠島》讓更多人知道改變的可能性，這樣的期待也反應在書中欲以主角一家人反映那一代人的寫作手法，以及主角回歸家庭的選擇上。

分別作為華美人女性及台美人女性離散敘事的《桑青與桃紅》及《綠島》，兩部作品出版相差四十年，作者聶華苓與楊小娜更相差將近五十歲，然而透過她們所書寫的作品，我們可以看到國家暴力與父權所形成的雙重壓迫並沒有隨著時代的演變消逝或有所好轉，而是以各種不同的形態一再壓迫女性，無論是《桑青與桃紅》中的桑青與後來奔走的桃紅，還是《綠島》中最後選擇留下的主角，她們都同樣因生而為女人，被迫要在面對國家暴力的同時也面對父權，為了生存而與之戰鬥。

引用書目

專書

- Charlotte Gilman 著，邵愛倫譯，《男性建構的世界：我們的雄性本位文化》（台北：暖暖書屋，2020）。
- 朱芳玲，《流動的鄉愁——從留學生文學到移民文學》（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2013）。
- 吳木盛，《鴨勇的腳印》（台北：前衛出版，2000）。
- 洪郁如、吳佩珍著，吳亦昕譯，《近代台灣女性史：日治時期新女性的誕生》（台北：國立台灣大學出版中心，2017）。
- 許維德，《族群與國族認同的形成：台灣客家、原住民與台美人的研究》（台北：遠流出版，2013）。
- 陳建守，《時代的先行者：改變歷史觀念的十種視野》（台北：秀威資訊，2014）。
- 雅克·德希達著，汪家堂譯，《論文字學》（上海：譯文出版，1999）。
- 楊小娜，《綠島》（台北：時報文化，2020）。
- 簡政珍，《放逐詩學：台灣放逐文學初探》（台北：聯合文學，2003）。
- 聶華苓，《桑青與桃紅》（新北：印刻文化，2016）。

專書論文

- Gerda Lerner, “New Approaches to the Study of Women in American History”,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3:1 (Oct., 1969), p. 55.
- Spivak, Gayatri Chakravorty, “Negotiating the Structures of Violence?,” in Sarah Harasym ed., *The Post-colonial Critic: Interviews, Strategies, Dialogues*. New York: Routledge, 1990, pp.138-151.
- 黃秀玲，〈文本跨界之得失：以中國中心、亞裔美國和女性主義的批評實踐來看聶華苓的《桑青與桃紅》〉，收入單德興編，《華美：華美及離散華文文學論文集（下）》（台北：允晨文化，2020），頁 506-544。

期刊論文

- 林幸謙，〈張愛玲的臨界點：閨閣話語與女性主體的邊緣化〉，《中外文學》24 卷 5 期（1995.10），頁 93-116。
- 郭淑雅，〈「喪」青與「逃」紅？——試論聶華苓「桑青與桃紅」／國族認同〉，《文學台灣》32 期（1999.10），頁 252-275。
- 陳佳紋，〈論《桑青與桃紅》中的女性意識與歷史書寫〉，《中文研究學報》3 期（2000.06），頁 147-163。
- 陳延媛，〈簡介近代亞洲的“賢妻良母”思想——從回顧日本、韓國、中國的研究成

- 果談起》，《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10 期（2002.12），頁 199-219。
- 馮品佳，〈鄉關何處？：《桑青與桃紅》中的離散想像與跨國移徙〉，《中外文學》34 卷 4 期（2005.09），頁 87-109。
- 黃素卿，〈華裔離散族群意識及華裔移民認同：《桑青與桃紅》和《千金》〉，《中外文學》34 卷 9 期（2006.02），頁 237-264。
- 黃儀冠，〈鄉關何處——論《桑青與桃紅》的陰性書寫與離散文化〉，《政大中文學報》1 期（2004.06），頁 69-301。
- 廖元豪，〈移民：民權的漏洞，還是民權的延伸？——評介 Kevin R. Johnson 的 The “Huddled Masses” Myth: Immigration and Civil Rights〉，《台灣社會研究季刊》61 期（2006.03），頁 417-431。
- 劉威廷，〈台灣重層語系研究——以《綠島》及其翻譯交涉為例〉，《彰化師大國文學誌學》40&41 期（2020.12），頁 79-108。
- Lerner, Gerda, “New Approaches to the Study of Women in American History,”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Vol.3, No.1 （1969）, pp. 53-62.

碩博士論文

- 丁威中，〈對抗歷史失憶：楊小娜的《綠島》〉（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英語學系碩士論文，2020）。
- 陳怡蓁，〈跨世代的主體性追求：楊小娜《綠島》之中的抗拒與共謀〉（台北：國立台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9）。
- 黃湘玲，〈國家暴力下的女性移動敘事：以聶華苓《桑青與桃紅》、朱天心〈古都〉、施叔青《風前塵埃》為論述場域〉（台中：國立中興大學台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

電子媒體

- 朱宥勳，〈紀念碑等級的台灣小說：朱宥勳讀聶華苓《桑青與桃紅》〉，（來源：<http://www.unitas.me/?p=12628>，2021.12.18 瀏覽）。
- 阿潑，〈一個台裔美國作家眼裏的二二八——《綠島》作者楊小娜其人其書〉，（來源：<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60804-taiwan-228/>，2020.12.18 瀏覽）。